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

李冬君 著



主编 刘泽华
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

第二卷

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二辑·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 主编 刘泽华

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

李冬君 著

0112579



20112579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AB711/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李冬君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二辑·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刘泽华主编)

ISBN 7-300-03850-6/C·249

I. 孔…

II. 李…

III. 儒家-传统文化-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656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二辑·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

主编 刘泽华

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

李冬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9.6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9 000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刘泽华

20 世纪末，经专家评议和教育部核准，南开大学组建了“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它是教育部在全国高校建立的百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当时确定了两个重大研究课题，其中之一便是“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这套书就是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在三年的时间里，参加课题的同仁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所得的成果是否合格，这需要由读者来评判。

我在这个序中简单说四个问题。

一是提出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初衷问题。

应该说，思想与社会互动不是一个新问题，无论哪种流派都会程度不同地给予关照。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阶级分析最为盛行，无论什么思想都要分析出它的阶级性及其社会意义。对这种做法大家后来有些倒胃口。随着改革开放与学术环境的变迁，学术风气有了很大变化，多数人向专门化发展，研究思想的只注重思想逻辑；研究社会的大抵限于问题的本身，与思想无大干系。有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要加强思想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我们提出“互动”有如下几层意思：其一是针对时下学界思想研究与社会研究不搭界的现象而提出的；其二在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与社会决定思想有别，又要与思想决定社会有别，我们所强调的是：思想与社会是“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三是强调思想与社会的汇通关系，在这里作为关键词的“思想”不宜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领域，思想关联着特定的语境（社会）；同样，作为关键词的“社会”也不是与思想分隔的，而是思





想文化建构的结果。在南开大学举办的“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上，庞朴先生有一段更凝练的概括，我引述于下：“照我的理解，就是不仅不能将思想与社会视同两截，不仅要将二者互相关联，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思想当作观念化了的社会、将社会当作物质化了的思想来看待，来研究，来说明。这样的研究，将既不属于社会史，也不属于思想史；既可视作思想史，也可视为社会史。准确地说，它是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具体点说，它将注意于社会的思想（观念）化和思想的社会（物质）化的形态、过程、现象、问题等等的研究。”

问题提出来了，在研究中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如果有人问，你们做得如何？我只能说：仅仅是开了个头。

二是选题的思路。

本套丛书的每本书各有自己的主题，但又都沿着“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这个大思路展开自己的触角。大致说来我们是沿着以下的思路来设计选题的：1. 政治哲学问题；2. 政治思维方式与政治文化范式；3. 政治理念的社会化问题；4. 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5. 人物的政治理念与行为。

每本书虽不是按题作答，但大体说来，各侧重一个问题来进行论述。

三是关于课题成员的组合问题。

从书名上看，一望可知，这套丛书每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更谈不上有机的构成，而是一个拼盘。这个盘子就是“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如果为了某种完美，比如历史的系统性，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写出一卷或多卷本通史，但这不是短期所能做到的，也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做学问宜于“接着做”，不宜“跳着做”，因此我聘请人加盟，首先考虑的是他们前期在做什么，能否与课题联系起来“接着做”？因此加盟的作者，除了几位年轻的博士外，都是胸有成竹之士。基于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手法，以发



挥作者的专长。每本书之间尽管没有直接的关联，但都围绕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这个主题来展示自己的个性。

四是关于研究方法问题。

一定政治理念的形成是社会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当我们说综合的时候，决不排除社会阶级、阶层和特定身份的内容，但我们的意思也很清楚，它又不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特定身份的直接的对应物。比如说本丛书中有一本《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帝王观念就是社会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依照我们多年以前习惯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剥削阶级的意识与观念，毫无疑问，至今我们仍认为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有其不可颠破的合理性内核，但如果仅仅如此，显然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帝王观念不仅仅是剥削阶级的产物，同时又是整个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各阶级、阶层、个人在主流上都认同帝王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归宿除了走向帝王体制，不可能有其他的出路。于是，我把上述观察问题的方法概括为“阶级—共同体分析法”。当我们用“阶级—共同体分析法”来看待各种政治理念时，我们既想打破习惯的阶级分析法的狭隘性和直线性，但又要保留它的合理性内核；我们既想吸取社会分析法，又想避免只谈社会不谈阶级的泛泛性。时下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元状态，这自有其道理，但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淡化或抛开了合理的阶级分析。对此，人们的看法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但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创造性地、适度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参加丛书撰写的同仁们未必在理论上都同意我这个概括，但我这个概括是容纳诸位同仁的个性的。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2003年6月于南开大学洗耳斋

目 录

前言 “圣化”之引论	(1)
一、问题之缘起与“圣化”之要旨	(1)
二、文化“三段论”与圣化“两核心”	(4)
三、两个概念区分与政治文化定性	(5)
四、“孔子再评价”与“王权主义”反思	(8)
第一章 从“神化”到“圣化”	(13)
第一节 殷周之际的革命	(14)
一、殷人的“神化帝王”观	(14)
二、周人的“圣化民主”观	(21)
第二节 春秋圣化大趋势	(28)
一、从民心到人性	(28)
二、从有德到有道	(33)
三、从礼仪到礼义	(37)
四、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42)
第二章 儒家圣化模式与孔子圣化	(49)
第一节 先秦儒家圣化模式	(49)
一、孔子圣化模式——“下学上达”	(49)
二、孟子圣化模式——“反身而诚”	(52)
三、荀子圣化模式——“化性起伪”	(57)
第二节 儒家分化与孔子圣化	(61)
一、先秦儒家三期演变及其圣化谱系的形成	(62)



二、王权下的《论语》结集和王化的孔子形象	(69)
第三节 先秦诸子论孔子与孔子的圣化	(75)
一、孔子入百家：先秦学术分化及其演进	(75)
二、走向外王的孔子：诸子的批判与认同	(77)
第三章 先秦诸子圣人观综述	(90)
第一节 先秦文化转型与诸子造圣运动	(90)
一、“圣”的本义及其在文化转型中的演变	(90)
二、诸子对圣人的设计与战国圣化之趋势	(95)
第二节 圣化：道、王、神一体化	(102)
一、“道化”——圣道同体	(102)
二、“王化”——圣王合一	(113)
三、“神化”——神圣一体	(123)
第四章 儒者革命与儒术复兴	(129)
第一节 博士儒的“王圣”运动	(129)
一、儒者的向往与皇帝的抱负	(130)
二、儒门“王圣”运动始末	(134)
第二节 儒者革命与汉初统一	(152)
一、王道与霸道串联	(153)
二、儒门的演变——从博士儒到革命儒	(160)
第三节 儒学更始与儒术运动	(174)
一、拨乱反正与继续革命	(174)
二、儒者的进取与儒术复兴	(192)
第四节 儒术的胜利与圣王大一统	(201)
一、儒术“应帝王”与儒学之兼容	(201)
二、素王之义与帝王之政	(206)
三、圣化的终结：圣王大一统	(213)



第五章 宋儒造圣思想论纲	(222)
第一节 圣人无我	(223)
一、圣人与天	(223)
二、圣人与理	(231)
三、圣人之心	(234)
四、圣人之性	(239)
第二节 圣人向圣王转化	(244)
一、圣人尚公尚同	(246)
二、圣人立己立人	(247)
三、圣人成己成物	(249)
第三节 圣王专制——“德政”	(251)
一、“德政”：王霸之辨	(251)
二、“德政”：以民为本	(253)
三、圣王教化人民	(257)
四、圣王改造个体	(261)
五、政治伦理与圣王专制	(270)
结语 走出圣化——批判与自觉	(276)
一、关于中国文化“质”的批判	(276)
二、儒家道德英雄主义之批判	(281)
三、文化模式批判与文化个体性自觉	(284)
参考文献	(291)
后记：“再思斋”问学	(295)

前言

“圣化”之引论

一、问题之缘起与“圣化”之要旨

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必然要讨论孔子。讨论孔子，千头万绪，从何说起？是沿着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路径，从礼与仁等观念的辨析入手，然后对其整个思想体系作价值评判，还是走出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路径，把他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看他的思想体系是怎样转化为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以何种方式主导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趋向？在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双方中，我选择了后者。这不仅是因为后者在学术领域属于更高一级的范畴，需要更多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创新，更因为后者能为历史问题提供更加完整的解决方案，能给予现实以更为深刻的启示。

经由这一思路，我对孔子进行了新的探讨，从而提出“圣化”的范畴。我认为，“圣化”比礼与仁等观念能更为深入地把握住中国文化的质，能更为清晰地展示中国文化之趋势。“圣化”并非儒家的专利，它是先秦诸子的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





在这一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是以法家为代表的“以王为圣”的圣化路线，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以圣为王”的圣化路线。这两条路线在秦汉之际和西汉初期作殊死之争，最终以独尊儒术和孔子圣化的完成得到解决。从表面看，解决采取了“定于一尊”的方式，而实际上观念的兼并是在学派的融合中完成的，“霸王道杂之”便是对这一融合过程所作的一个确切的政治文化的表述。

通过对孔子圣化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儒家的圣化路线，怎样从边缘进入主流进而成为主导，怎样规范并决定着中国文化的质和文化的趋向，不仅从王权政治边际平衡的错综复杂的实际需要上，更从“理性的狡计”即思想运动的内在规律上，从儒家的现实选择即学派得以安身立命的本质和策略上，进行更加深入和更为全面的考察。这一考察所起的作用，不光是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建立起儒学研究的新范式，它还为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提供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基础，为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转型提供着历史的经验和依据。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孔子一直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学地位，讨论中国文化谁也绕不开孔子，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学术残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孔子也依然成为大批判的对象。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孔子又作为传统的化身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得不对他进行选择：是沿五四之路继续前进，还是回归孔子、复兴儒学？前进派发扬五四精神，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回归派则企图从儒学经典中，从儒学道统中，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互动、历史与现实关联出发，去发现和发掘自由与民主的传统。

这两派文化认同一致，而文化策略迥异，一取五四精神，一取儒学传统。这两种取向，在学术上表现为两大流派，一是反思派，将孔子还原于历史；一是复兴派，要将儒学发扬光大。



本书的立场属于反思派，通过对“孔子圣化”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将孔子还原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把他放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对其历史作用作客观的求实的评价。然而这种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对“历史条件”如何看待和怎样理解的问题：是将“历史条件”理解为孔子生前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抑或将其延伸至他死后的秦汉大一统，或是将其继续下延至秦汉以后的各朝各代？

我们没有对“历史条件”作这种以王朝为本位的历史分期式理解，而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它定位在“圣化时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世纪”。对于“中世纪”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历史的理解，另一则是作为文化的理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作为历史分期，它被置于上古和近代之间，已经终结了；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却不能这么狭隘，作为历史时期，“中世纪”是终结了，可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中世纪”依然还以“圣化”的方式而存在。



因此，我们从孔子圣化入手，提出中国文化“三段论”——“神化”、“圣化”和“公民化”，圣化文化“两条路线”——圣王路线和王圣路线，“三种模式”——孔子“下学上达”、孟子“反身而诚”和荀子“化性起伪”，并揭示出圣化文化的两个核心理念——人民性和革命性，以及它们在秦汉之际是怎样推动着儒者革命，在汉初之时又如何继续在继续革命——改制中，实现儒术大一统，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化使一家之言上升为王权主义，使野人孔子成为王者万世之师。

与此同时，我们还指出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走出圣化”，确立人民的“文化个体性”——“公民”，以民主取代民本，以法治取代革命，简言之，就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段”展开——“公民化”。公民化与圣化迥异其趣。圣化的原则是，以王为体，以圣为用；以“无我”为体，以人民为用。而公民化的原则是，以个人为体，以公民为用；以自由为体，以法治为用。圣化之



用是王化，公民化之用为民主化。圣化之用，以民为“蒙”，故教化不离“启蒙”；公民化之用，以自我为“圣”，故教育要在“自觉”，从文化人民性启蒙到文化个体性自觉，从整体性的人民到个体性的公民，乃公民化之谓也。

二、文化“三段论”与圣化“两核心”

我们认为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化，就其文化形态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一是神化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以神道设教，率民事神，它集中在神话与历史交错的夏、商、周三代；二是圣化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从事神转向尊圣，从神道设教转向以民为本，从君权神授转向内圣外王，它始于殷周之际的民本主义革命，成于孔子的性与天道之自觉，时间划分在西周以后、民国以前；三是公民化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从君权转向民权，人民的具体身份从臣民转向公民，政治理念从民本转向民主，其阶段发轫于近代以至于今。

我们对孔子的考察和评价，是将他置于“圣化时期”内作为历史人物进行反思，而非超越历史条件对他一如既往地作什么“万世师表”式的评价，这种评价与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质的规定性格格不入。我们的立场是要走出圣化，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回眸那个圣化的孔子，作为历史人物我们仰之弥高也好，叹为观止也好，他的使命毕竟已成历史。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重新感受一下古典时代的文化精神，体验一下文化传承中搏动的生命激情，与各种思想的幽灵作无拘束的对话，使我们当下的存在，在对先哲们的同情的了解中进入永恒的生命之旅，这无疑是一种最为奢侈和诱人的享受——让生命诗意地栖居于历史。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那种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一不留神就会再度萌生乌托邦式的憧憬，那样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莫名其妙地激活圣化的幽灵，使我们堕入历史的怪圈而



再度沉沦，无论尊孔还是批孔都难以走出圣化的历史性宿命。

五四以来，各种各样的反传统的思潮和运动，虽然波澜壮阔，改变了文化的面貌，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但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在指出了目标和方向之后却迷失了路径，歧路亡羊的故事在自命不凡的新文化运动中同样发生。过分自信的新文化，无论其整理国故还是全盘西化，都不妨碍两个圣化的幽灵借尸还魂，它们以神圣的名义使新文化保持沉默，使各种反思的运动退避三舍。这两个幽灵是圣化的核心理念，一是民本主义，一是圣人革命，它们“好风凭借力”，在革命救国的口号中依然青云直上。新的文化还来不及分别民本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就被鱼龙混杂的革命洪流推向前去，进入新文化的民本主义革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得到新文化的认同。于是，我们的思想在这两个幽灵的诱惑下以最激进的方式堕入圣化的怪圈，当继续革命的口号响彻云霄之时，这两个徘徊的幽灵正如日中天；当反思也需要下地狱的勇气时，我们的思想就长期被禁锢在圣化的怪圈里裹足不前。

三、两个概念区分与政治文化定性

走出圣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更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学人，不管自觉与否，都或多或少要承担这一使命。本书作为这项工程的基础性工作的一部分，它的任务不是全方位探讨如何走出圣化等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理论问题，而是为将来从事多方面的理论研究作一些必要的学术史的准备。

在这里我们先要区分两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一个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司空见惯的“圣人观”的概念，还有一个就是在近几年开始兴起的“圣化”概念。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圣



人观”是对圣人的看法，具有面面观的性质，它是传统人性论的终极追求，被古典伦理学确立为人格范式、人生理想，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它又被赋予了与最高政治权威“王”合一的属性。而“圣化”的概念则不对人性进行品分，也不在政治思想中为圣人确立坐标，而是在文化的总体框架即天人古今关系中阐明圣人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不断强调其核心理念民本主义和圣人革命的普世性功能，以及这一功能对于文化的价值取向的引导和评价作用，使被动的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自觉地将其个体性消解在“人民”这一虚拟的普遍性中，从而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圣王合一的王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

因此，“圣化”首先是指一种文化质的规定性。当我们提出“文化”这一命题时，通常总是不假思索、不作任何分辨地将“文”和“化”两个字随便连在一起，其实“文化”是一个主谓结构，“文”是主语，“化”是谓语，以“体用”言之，则“文”为体，“化”为用。所谓“文化转型”，一般是指作为“文”的主语、主体的转换，而作为谓语的“化”的功能总是不变。中国文化转型中作为主语的“文”已经换了两次，第一次是以“圣”替换“神”，文化转型是从“神化”到“圣化”。“神化”是以“神”为文即以“神明”为主体的文化，而“圣化”则是以“圣”为文即以“圣人”为主体的文化。第二次是以“公民”替换“圣人”，文化转型是从“圣化”到“公民化”，“公民化”是以“公民”为文即以“公民”为主体的文化，第二次转型就其语态而言仍处于“现在进行时”，“公民”作为文化的主体虽被确认但尚未确立。其次，是在文化的句式如何确立宾语，并使宾语达到对主语的完全认同，从而上升到主语的问题。例如在“神化”文化中，“率民以事神”，“民”就成了“神化”的宾语，“事神”就是宾语“民”对主语“神”的认同，但是，在“绝地天通”以后，“民”与“神”绝对二分，作为宾语的“民”不可能上升为主语“神”，因而有了圣人革命。在“圣化”文化



中，“以民为本”，“民”也成了“化”的对象——宾语，在这一文化句式里，圣人作为主体，人民作为载体，圣人作为主导，人民作为基础，作为宾语的“民”除了向主语“圣人”认同，还可以向圣人转化，“人皆可以为尧舜”不仅透露出这种转化的消息，而且还对“民”提出了“自化”的要求。“自化”的对象是自我，化到“无我”时宾语就上升为主语。因此，在“圣化”的文化句式里，作为宾语的“民”处在“圣化”与“自化”的对立统一之中。

然而，当普遍的“自化”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时，“圣化”与“自化”的潜在对立便显现出来。一旦历史机遇成熟，作为宾语的“民”的“自化”最终要回到对自我的肯定上来。这种对自我的认同，便以民主革命的方式，推动“圣化”向“公民化”转型，从而达到对民的本质的绝对肯定。在这种绝对肯定中，民从宾语状态解放出来，完全上升为主语。在“公民化”的文化句式里，“化”的对象不再是作为整体的民，而是作为个体的“我”，正是在个体“我”的自律中，实现文化个体性的自觉。

本书不对文化转型问题作全面的研究，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可资参照的理论背景和可以借用的理论框架。本书着重考察在先秦诸子普遍的圣化思潮中，孔子是怎样脱颖而出，从宾语上升为主语，从载体上升为主体，以及与孔子圣化有关的学术演进、学派兴衰及其政治沉浮，在时间上我们将它约定在春秋至秦汉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圣化模式的成型期，也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由私学转变为官学，从一家之言上升为意识形态，以一介布衣而为万世师表的时期。此后这一圣化模式经历了唐宋之间三教合一的融合期，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维新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又开始进入转型期。那些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一只脚走出了圣化，另一只脚却还留在圣化的门槛内，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从民本主义的情感里走出来，没



有一个人敢独立反对以圣人革命的方式来开创历史的新局面，也就是说，这些文化英雄们的文化个体性仍处于转型之中。直到如今，政治文化从圣化向公民化的转型仍未完成，公民化的思想观念已经出现，公民化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而公民化作为一种文化却尚未成型。

本书的学术研究定位在“圣化时期”的成型期，以后将逐步进入融合期和维新时期乃至转型期的研究领域。在开题宗旨上，本书除了坚持“反思”的思想立场，还遵循着“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路径，并以“王权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定性为思想前提。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除了坚持思想史的研究传统，即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还着眼于“观念的考据学”，不仅对观念的结构作静态的功能性分析，还要对观念的起源及其演进作动态的发展性描述，尽可能地将历史的观念及其作用，置于具体的政治文化的背景中，使之凸显出来作为牵引时代及其历史事件的绳索和灵魂。它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不是让历史事件按先验理性的逻辑预设逐步展开；也不是分析的历史哲学，仅仅对历史的性质作知识论的诠释；而是反思的历史哲学，从文化的个体性出发去认识历史本身，并以个体性为基础来建立历史本体论。



四、“孔子再评价”与“王权主义”反思

对孔子及其儒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显学，在 20 世纪以前它还是意识形态的显学。20 世纪初儒学的文化地位被马列主义取而代之，其意识形态身份也在新的文化潮流中失落，然而它在学术史上的显学地位，不管怎样评价却一直没有动摇。

顾颉刚先生在 1927 年发表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指出孔子生前及其死后命运的变迁，描述了孔子由君子而圣人，由圣人而教主，最终复返君子的历程。作为